

湘学研究

二〇一三年第一辑（总第一辑）

• 湖南省湘学研究院 主办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湘學研究

二〇一三年第一輯（總第一輯）

• 湖南省湘學研究院 主辦 •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湘学研究：2013年第1辑（总第1辑）/湖南省湘学研究院主办.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6
ISBN 978-7-5161-2885-5

I. ①湘… II. ①湖… III. ①学术思想—思想史—研究—湖南省
IV. ①B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42590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王 茵
责任校对 任晓晓
责任印制 王炳图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邮编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装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16
印 张 12.75
插 页 2
字 数 303千字
定 价 40.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湘学研究》编辑委员会

主 任 王伟光

副主任 路建平 许又声

委 员

王伟光	路建平	许又声	方克立	张海鹏
刘建武	朱有志	唐浩明	刘云波	王兴国
王继平	朱汉民	李育民	杨念群	曹 新
彭平一	向志柱			

主 编 朱有志

执行主编 刘云波

副 主 编 向志柱

编辑部主任 毛 健

《湘学研究》总第一辑目录

崇实重行 弘大湘学

——专家学者热议湘学及其当代价值 王伟光等 (1)

近代湖湘文化与近代中国 王兴国 (8)

湖南人与辛亥革命 饶怀民 (33)

重评曾国藩 王继平 (41)

重评曾国荃 刘绪义 (60)

屈原与湖湘士人的人格建构 朱汉民 (74)

曾国藩的修身思想析论 李育民 (86)

简析谭嗣同的“复生意识” 殷鸿博 (110)

《湘军志》毁版事件与湖南绅士的湘军情结 彭平一 (118)

湖湘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周秋光 (126)

雷锋精神与湖湘文化传统 朱 凯 周 萍 (133)

王船山家世、家学、家风传承考 彭大成 (137)

崔暕学行事迹考 张京华 (153)

近代湖湘史学的发展 王国宇 (162)

近代湖湘学者的外国史地研究 马延炜 (176)

内藤湖南与“湘学” 刘岳兵 (186)

【特稿】

崇实重行 弘大湘学

——专家学者热议湘学及其当代价值

编者按：本文原载《光明日报》2013年5月30日第11版，《光明日报》约请的专家学者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观点和建议，对湖南省湘学研究院的发展以及各项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刊特此转载，以飨读者。

《光明日报》编者按：千年湘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湘学以其厚重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文化张力，深刻陶冶和孕育了一大批经邦济世的杰出人才，为推动中国社会变革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湘学所倡导的心忧天下的爱国情怀、百折不挠的顽强品格、敢为人先的进取精神、兼容并蓄的开放意识，不仅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而且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研究湘学、弘大湘学，乃发展湖南和当代中国、繁荣中华文明之要务。借此成立的湖南省湘学研究院，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为此，本刊特别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委杨胜群，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李捷，新华通讯社副社长路建平，西北大学名誉校长、清华大学博士生导师张岂之，中国哲学史学会名誉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方克立，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海鹏，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毛泽东研究专家罗斯·特里尔就“湘学研究院研究什么、湘学研究院如何推进湘学研究、湘学研究如何促进当代发展”等问题展开探讨。

湘学的内涵与外延

〔湘学是一个有特定内涵和时空范围的学术思想史概念。湖南省湘学研究院倡导的湘学应该而且必须是“广义湘学”，即不仅要研究文化和学术意义上的“狭义”湘学，更要研究湖南当下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人、事、物的“广义湘学”。“狭义湘学”研究是“广义湘学”研究的基础，肯定而且有必要继续推进。湖南省湘学研究院要借助“湘学”这个平台，带动湖南的历史文化、社会习俗、教育科技、人名名著、湖南人的精神特质等方面的研究，扩大湖南在中国

乃至世界的影响力。]

王伟光：一本湘人奋斗篇，半部中国近代史。近代湖湘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缩影。近代湘人和在湘人士在中华民族复兴奋斗的舞台上演绎了无数悲壮史剧，更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由此上溯越千年，中华民族多少英雄豪杰、仁人志士在潇湘大地豪迈放歌、奋勇拼搏，为中华民族的繁衍发展、为中华文明的兴旺发达，奉献了自己的心血乃至生命。研究湖湘人文，树传立史，谈经论理，弘大湘学，乃是发展湖南和我国经济社会文化、繁荣中华文明的一件要事。

方克立：湘学是一个有特定内涵和时空范围的学术思想史概念。它是中国传统学术即“国学”的一部分，具体说是中国儒学、宋明理学的一部分，与濂、洛、关、闽、江西之学，浙江婺学等地域学术传统一样，都是属于宋明理学中的不同学派。从两宋到清末，湘学学者都认同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尊崇宋明理学，坚持儒家道统，这是决定其学说、学派性质的一个基本特点。另一方面，湘学又有自己的独特个性，就是反对空谈道德心性，主张“学贵力行”、经世致用，提倡实事实功之学，是宋明理学中很有特色的一个学派。北宋的周敦颐是宋明理学的开山，也是湘学肇始的一个象征性人物。南宋时期以胡宏、张栻为代表的湖湘学派，是当时影响很大的四大理学学派之一。明清之际，湖南出了大思想家王船山，他是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总结性人物，也是从古代湘学过渡到近代湘学的关键人物。在中国近代历史的几个重要关头，湘学人物都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并相应地出现了几个人才群体。其中包括鸦片战争前后以陶澍、魏源等人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人才群体，咸丰年间以曾国藩、左宗棠等人为代表的湘军儒将集团，19世纪末以谭嗣同、唐才常等人为代表的维新派人才群体，20世纪初以黄兴、蔡锷、陈天华、杨毓麟等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人才群体。他们大都出身于岳麓、城南等书院，深受湖湘学统的熏陶，也在新的历史时期发展了湘学的学理和学风。

张岂之：湖湘文化是中国地域文化当中很有特色的一枝奇葩，而湖湘学派正是湖湘文化的核心精神。对湖湘学派，历史上有“湖湘学”、“湖南学”、“湖南一派”、“湖湘学派”、“湖湘学统”、“潭学”等称呼，梁启超、侯外庐等先生也使用过“湖湘学派”这一名称。“湖湘学派”主要指胡安国、胡宏父子和张栻为代表而建立的理学，由理学宗师周敦颐开源奠基，胡安国、胡宏父子开统，张栻总其大成。湖湘学派精神余脉传承久远，明清之际湖南有大儒王夫之，他是理学集大成者，远绍多端，并无师承；后来者曾国藩、谭嗣同、皮锡瑞、王闿运、王先谦等踵事生华，杨昌济、毛泽东也受到湖湘学派的影响，这些有代表性的人物著述宏富，其学虽然有所不同，但是共同特点是崇尚实事、实学、实用、实践，经世致用之学是湖湘地域学术的显著特点之一。

杨胜群：湖湘之地，曾经被称为荆蛮之地，“罪官”、“犯将”贬逐于此。遭贬逐者却多为有识之士。他们曾“居庙堂之高”，沦落江湖之后，更感到国运沉沦、民生疾苦，忧患于心，发乎为诗文，成为湖湘文化之滥觞。历屈原、贾谊、杜甫、柳宗元直至范仲淹，形成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湖湘人文精神。两宋时期，湖湘学派形成，为湖湘人文精神注入了更为积极的理性因素。明末清初，由王夫之引领，湖湘人文精神出现了新的提升。近代

以来，湖湘人文精神升华为一种以天下为己任、敢于担当的境界。魏源、左宗棠、谭嗣同、蔡锷、黄兴等人物相继在湘地崛起，在万马齐喑的时代，重新抖擞，或开思想先河，或力挺国家中兴，或喋血革命。20世纪20年代之后，湘地又崛起了心忧天下的毛泽东、蔡和森、刘少奇、任弼时、彭德怀、贺龙等新一辈人物，湖湘人文精神在他们身上得到了革命性的升华。

李捷：“惟楚有才”，历史上的湖湘大地以一种宽厚博大的胸怀接纳着被罢黜、贬谪、流放以及迁徙的文化名人。这片土地大家辈出、群星荟萃，他们接力传承，造就了盛极古今的湖湘文化。屈原开浪漫主义之先，也称得上是“哀民生之多艰”现实主义的鼻祖。承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和隋唐佛学之盛，湖湘文化大开大合，返本开新“儒、道、释”等诸家之学，成就了宋明理学这一中国历史上唯心主义的巅峰，推动了“学而优则仕”的科举制度不断丰富和发展，成为当时的“经世致用”之学。明末清初，以王夫之为代表的湘学人，顺应时代潮流，革宋明理学之弊，集中国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之大成，开创船山学派，影响了有清和民国的几代人，为近代中国社会“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准备了思想和人才基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为湖湘文化注入了新思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相结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秉承五四运动优良传统，批判吸收古今中外优秀的文化思想，着力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中华文化“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前提下的新发展，为中国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继承弘扬湖湘文化精华，并注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精髓，为中国共产党奠定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安身立命之本，也是传世之宝。历史证明，湖湘文化具有返本开新、兼收并蓄、实事求是、经世致用的优良品格。

方克立：在湘学研究中，要不要提“现代湘学”这个概念？有没有“现代湘学”？什么是“现代湘学”？传统湘学是一种前现代的理学型的学术文化，它能不能转化为某种现代学术形态？怎样转化？我个人认为回答这些问题要慎重，要根据事实说话。毛泽东曾经深受湘学传统的影响，但是我们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成果之一的毛泽东思想归属于“湘学”的范畴，因为它不是对传统湘学的简单继承和延伸，而是对传统湘学的根本改造和超越，两者有性质上的根本不同。比如“实事求是”是湘学的一个重要传统，曾国藩将实事求是解释为朱熹讲的“即物穷理”，就是把它理学化，毛泽东则把它改造成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命题，使它获得了全新的意义和价值。不但不能把毛泽东说成是“现代湘学”的代表人物，就是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湖湘学统影响的李达、金岳霖、李泽厚等现代湘籍学者，也不能把他们的学术思想归结为“现代湘学”，因为不论是马克思主义、新实在论还是所谓“人类学本体论”，都是一种现代性的思想学说，不能将其框限在某种传统地域学术文化的范畴内。今天中国的几大思潮，代表人物中间都有湖南人，他们之间的思想分歧和相互关系实际上是当代中国整个思想格局的反映。像濂学、洛学、关学、闽学、湘学、蜀学、浙学、徽学这样一些有特定时代内涵、表现出地域文化特征的传统学术概念，都不能随便延伸到现在，否则容易混淆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的界限。

张海鹏：湘学和湖湘文化之间有没有区别？这个值得思考。湖南的学者常常喜欢说湖湘文化，湖北的学者（我是湖北人）喜欢说荆楚文化，其实在我看来，荆楚文化更多的是指湖南湖

北文化,我提出一个概念叫“湖广文化”,这可以把两湖自楚文化以来的发展予以概括。湖南、湖北两省是清朝雍正年间才分治的,以前一直叫湖广省,清朝设湖广总督,管辖湖南、湖北两省。湖北、湖南的文化,有许多共同性。湖南、湖北这一带的文化现象,在很长的历史里头,我觉得有太多的共同之处。因此我觉得,研究一种学问,应该是将更多的同质性放在一起来观察研究会比较好一点,不能够以现在的行政区域做绝对的划分。所以,如何开展湘学研究,应该把这些情况纳入考虑范围。

如何推进湘学研究

[湖南省湘学研究院要用历史、批判、开放、现实、创新的观点来研究湘学,要有雄心、有信心、有恒心,深入挖掘湘学的精神资源和时代价值,加强湘学普及和湘学宣传,提升湖南人文精神。通过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努力,将湘学打造成敦煌学、吐鲁番学一样的地域文化品牌,在湖南走向中国、走向世界的舞台中起到重要作用。]

王伟光:要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的基础上来统一思想,用历史的观点、批判的观点、开放的观点、现实的观点、创新的观点来研究湘学。研究湘学还要提倡三种服务:为现实服务,为湖南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服务。研究湘学,不要把它当成仅仅是研究学术之学,要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出发,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学术导向,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哲学思维看湖湘,要以实事求是、务实重行的哲学思维方式来研究湘学;研究湘学,不要把它当成仅仅是研究湖湘之学,要把它看成中国学术、中华文化的有机部分,站在全中国、全世界放眼看湖湘,要以面向全国、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开放眼光和远大视野来研究湘学;研究湘学,不要把它当成仅仅是研究湘人之学,要重视非湘籍人士的贡献,以开放包容之心看湖湘,要以更为宽阔的视阈、更为开放的心态、更为兼容的文化自觉自信来研究湘学;研究湘学,不要把它当成仅仅是研究历史之学,要古为今用,以批判地借鉴继承、为现实服务的心态看湖湘,要以为现实服务、为今天服务,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学风来研究湘学。

李捷: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是加强文化建设的根本指针,是湘学研究应当把握的首要原则。湘学研究应该发扬立足湖湘、服务全国、放眼世界的优良传统,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服务于“中国梦”的伟大实现。只有这样,才能找准湘学在新时期以及历史发展中的价值和定位,也才能真正体现湘学的经世致用传统。毛泽东所讲的“古今中外法”是湘学研究应该遵循的基本方法,也是湘学与时俱进、返本开新、服务当代的关键所在。因此,湘学研究不能做成书斋里的学问,也不能是复古、训诂的考据之学,而一定要树立实践品格,善于从湖南大地这一局部发现全国战略发展的大局问题,善于从湖湘文化的滋养中发现当下中国文化发展的优秀因子,善于从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中总结提炼文化发展进步的有机要素,真正造就湘学研究“植根人民、博古通今、学贯中西、服务当代”的宏大气象。

张海鹏：无论是研究湘学，还是研究湖湘文化，指导思想都要明确。无论是广义湘学还是狭义湘学，都要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实事求是地看待湘学的历史和湘学的发展，看待湘学在今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最重要的就是要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上来统一对历史的看法。同时，湘学不仅是湖湘之学，更是中国的湘学，要以博大胸怀和开放眼光来开展湘学研究。要勇于接受不同意见，敢于接受来自各方面的批评。

方克立：如何推进湘学研究，我讲三点看法：第一，严格的学理意义和作为一种地域学术传统的湘学，是指从两宋到清末，在湖南地区产生和发展的一种将儒家的性理哲学与经世之学相结合，主张体用合一、“内圣”与“外王”并重的学术形态，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千年湘学”或“传统湘学”。这应该是湘研究的主体内容和核心内容。第二，除了研究千年湘学之外，还要做历史文化溯源的工作，包括考察古代南方楚文化的影响，以及屈原、贾谊、柳宗元、刘禹锡等宋以前流寓湖南地区的学者所做出的贡献，甚至可以追溯到楚祖鬻熊，追溯到舜文化和炎帝文化。叶德辉说：“湘学肇于鬻熊，成于三闾。”三闾大夫屈原是周敦颐以前古代湘学的另一个象征性人物，但是宋以前的湘学与宋以后的湘学情况非常不同，两个阶段有重要的差别。从某种意义讲，宋以前并不存在宋以后那样一种有特定的学术内涵和学术传承特点的湘学，那时还没有形成所谓“湖湘学统”。第三，要研究千年湘学、传统湘学的现代影响和现代意义，包括研究湘学精神的现代转化问题。这种研究主要是总结千年湘学中的积极内容和精神价值，充分发挥它对今天湖南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的促进作用。

张岂之：在推进湘学方面，要注重从以下三个层面展开：一是利用现代多学科的方法，对湖湘学术进行科学总结，比如总结其理学、经学、史学、文学、科技等方面的成就。这是湖湘学术实现现代转型必须尽力去做的。二是注意发掘湖湘学术的现代价值，服务于当代社会。湖湘学与理学关系深厚，一直有重视道德研究和践履的传统，如果结合当代社会问题加以研究，发扬优良传统，使之贯穿于教育，显然有利于当代公民的道德建设。三是注意湖湘学术与中原文化、其他区域文化关系的研究，例如与洛学、闽学、徽学的互动关系，这样有利于开阔视野，更有利于揭示湖湘文化的特质，从而丰富中国文化整体研究。

路建平：湘学研究院在起步阶段，首先要有舆论声势，以引起大家的关注。宣传要靠组织，要善于运用新媒体，举行一些带有推广性质的座谈会，找一些已基本达成共识或还需要讨论才能达成共识的话题，邀请专家学者讲一讲。如果围绕一个或几个大家关心的话题连续搞些有成效的活动，不怕不能把观众的注意力吸引到湘学方面来，不怕湘学研究的人气培育不起来。要注意在网络上搞专家座谈会，以最便捷和迅速的方式扩大湘学的影响。我们在对已有的成果做了一些梳理以后，特别是基本达成共识以后，还要请一些有研究的同志在高校开讲座，把成果推介出去。在进入高校课堂的过程中，要注意延伸湘学研究范围，提升层次，进一步寻求学理支撑、构建学科体系。

罗斯·特里尔：我们研究湘学尤其是湖湘人物如毛泽东这样的历史人物时，需要特别注意其所处的时代，后来者在看待问题时，往往容易站在当代人的角度来对历史人物吹毛求疵，我们不能责怪前人过时了，因为我们如果这样做的话，前人可以将责任推到我们身上，说后来人

完全不能理解当时的情形。同时我们要注意对材料的发掘,要从浩如烟海各式各样的材料中发现对我们有用的东西,这需要花费巨大的精力,当然档案管理机构也应当在适当时机将一些不为人知的档案公之于众。当我们发现了某些有用的东西时,一定要采取适于公众所习惯的方式使其为公众知晓,这样人们才能够获得相对完整的历史映像,建构起完整的历史观念。

湘学如何促进当代发展

[历史上的湖南在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举足轻重,然而,改革开放以来,湖南和湖南人在全国的地位似乎在削弱。湖南省湘学研究院有责任和义务全身心投入文化强省建设热潮当中,为提升湖南文化软实力,重塑湖南在全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形象,重塑湖南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地位,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湘学研究院要学以致用,力争在宣传湖南形象、扩大湖南影响、培育湖南新人方面奋发作为。]

王伟光:从作为传统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意义来讲,湘学要研究古往今来的历史与人物,但湘学不是为历史而历史、为古人而古人,要为现实服务。既要研究历史上的湘人湘事,也要研究当今时代的湘人湘事,要为湖湘的当代发展做贡献。研究湘学,不仅要研究历史时期的湘学,更要研究湘学的现代继承和创新问题,要拓展现代湘学研究的对象、范围、内容等。研究湘学,不完全是为了研究湖南、宣传湖南、发展湖南,更多的是为了实现今天中国的现代化。

杨胜群:学术文化与人文精神从来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带地域性的学术文化,它的精髓必定是当地独特人文精神的反映。学术文化也只有深刻揭示人文精神,也才有自己的生命。传统湘学所表现出来的“实事求是”、“经世致用”和兼容并蓄、变革求新的学术精神,无疑是湖湘人文精神在学术文化上的体现。正是由于这样,湘学才得以在历史上独树一帜,并且历久弥新。因此,今天振兴湘学,要继承和发扬湘学的优秀传统。自古以来,湖湘之域因其独特的地理、历史环境等,逐渐形成一种既具有中华文化共性又具有鲜明地域特点的湖湘文化和以心忧天下、以天下为己任、敢于担当等为主要特质的湖湘人文精神。新中国成立以来,湖南与其他地区的文化地域特色比较依然存在,在湖湘文化影响下,涌现出了文学湘军、出版湘军、电视湘军。今天我们要提倡“新湘学”的概念,这种湘学是继承旧湘学并有所创新发展的,要通过湘学研究振兴湖南人文精神,给湖南人才成长提供文化土壤,提供学术精神,给当代湖南的发展鼓劲,要让湘学为“中国梦”和民族复兴大业提供正能量!

方克立:湘学研究必须为现实服务,为文化强省、文化强国做贡献,传统湘学可以提供许多有价值的精神资源。比如湘学中有一种注重探讨宇宙人生之大本大源问题的原道精神传统,湘学提倡知行统一、强调“学贵力行”和经世致用的实学学风也非常突出。另外,一些湘学人物还表现出了不囿成见、兼容并包的开放气度和与时偕行、变革求新的通变精神。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不论是南宋时期的湖湘学派,还是明清之际的王船山,都表现出了坚持民族大义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这些宝贵的精神资源,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经过批判继承

和创造性的转化，都可以为今天的现实服务，为今人提供思想启示和历史借鉴，有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路建平：探讨湘学问题不一定只是湖南人，还可以请一些有不同地域文化背景的专家，这样既可以看到优势，也可以看到不足，换句话说，请省内省外、国内国外的专家和我们共同研究湘学、研究湖南，集思广益，从不同角度认识、比较和提炼，这样会更有利于湘学研究的发展，更有利于湖南的发展。凡是关心湖南的各界名流，都要想办法把他们的注意力吸引到湘学方面来，让他们为宣传湘学、弘扬湘学，为宣传湖南、建设湖南献计出力。

张岂之：湘学研究院当然要立足于高深研究，但是也要注意学术成果的普及和传播问题。希望湘学研究院的成立能推动湖湘学术文化探究的深化和发展，做到既有阳春白雪，也有下里巴人，实现学术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良性互动。

罗斯·特里尔：我们一定要注意传统文化的普及，要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和知道传统文化，尤其是要以年轻人喜爱的方式让传统文化受到欢迎。教材当中应当有很多传统文化的东西，只有教科书当中有这类内容，湘学才能被年轻人所认同。

【链接】湖南省湘学研究院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提议、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周强亲自关心、支持下，于2012年6月4日揭牌成立的湘学研究机构、组织机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徐守盛任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新华通讯社副社长路建平，湖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许又声任名誉院长；湖南省政协常委、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原院长朱有志任院长；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副厅级纪检员刘云波任常务副院长；湖南省作家协会主席唐浩明、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原所长王兴国、湘潭大学副校长王继平、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朱汉民、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李育民、中南大学教授彭平一任副院长。湖南省湘学研究院主办有湘学门户网站中国湘学网（www.xiangxuecn.com），编辑出版《湘学研究》集刊、《湘学年鉴》及内部资料《湘学通讯》等。

近代湖湘文化与近代中国

王兴国*

摘 要：近代湖湘文化对近代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近代湖湘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对近代中国的影响；二是近代湖湘经世致用学风对近代中国的影响；三是近代湘人对外开放思想对近代中国的影响。在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方面，王船山的《黄书》宣扬“夷夏之辨”，是辛亥革命期间民族主义思想的主要来源；谭嗣同、唐才常、宋教仁为变法维新和革命事业捐躯就义，体现了近代湘人的爱国精神，时人以“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来歌颂近代湖南志士的爱国热忱。在经世致用学风方面，魏源编选《皇清经世文编》，对近代中国学风的转变有巨大影响；钱基博的《近百年湖南学风》历叙湖南先贤，也将近代湖南学风概括为“经世致用”，并意图推广发扬，作为社会实践的指导。在对外开放思想方面，魏源最早提出学习西方的“器物”，郭嵩焘等人则倡导学习西方的政教制度，杨昌济则注意到要从思想层面向西方学习，器物、政教、思想三个层次的划分，体现了近代中国对西方文化领会的逐层深入。

关键词：近代湖湘文化；民族主义；经世致用；对外开放

近代湖湘文化的繁荣对近代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所以它不仅在历史上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而且在当代“文化热”中，也是人们颇为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我认为，近代湖湘文化对近代中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文化精神方面，其最突出者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近代湖湘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在古代，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往往是一致的，因为所谓民族主义一般是指汉民族的民族主义，站在这种民族主义的立场，往往把反抗周边少数民族对中原地区入侵的斗争称为爱国主义

* 王兴国，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义。到了近代,“民族”的内涵已经由汉民族扩展为“中华民族”,所以民族主义的内涵也经历了一个从汉民族的民族主义到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的转变过程,爱国主义也就从传统的爱国主义发展到现代的爱国主义。

(一)“湖南者,民族主义之出产地也”——王船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在明清鼎革之际,由于清代的统治者是满洲贵族,所以在满洲贵族入主中原之后,以汉民族为代表的广大士人对于满族统治者表示了激烈的反抗,民族主义思想在清初曾表现得十分强烈。王夫之就是这种民族主义的最集中的代表者之一。后来,随着清代统治的巩固,这种民族主义思想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但是随着清代统治的衰落,民主主义思想的传播和深入,汉民族的民族主义情绪又一次高涨。由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船山的著作湮没无闻,到了近代才逐步刊刻流布,所以船山的著作成了这一时期民族主义思想萌发的酵母。正如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所说:清初几位思想家如黄宗羲、顾炎武、朱之瑜、王夫之等,“他们反抗满洲的壮烈行动和言论,到这时因为在满洲朝廷手上丢尽中国人的脸,国人正在要推勘他的责任,读了先辈的书,蓦地把二百年麻木过去的民族意识觉醒转来”^①。

船山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在戊戌变法时期就已经开始显露。例如,谭嗣同在《仁学》中对清代统治者的批评,有些就是从汉民族本位的立场立论的。他说:“奈何使素不知中国,素不识孔教之奇渥温、爱新觉罗诸贱类异种,亦得凭陵乎蛮野凶杀之性气以窃中国。”^②这里就直接地点名批评了满洲贵族。他又批评辽、金、元、清居统治地位的少数民族“其土则秽壤也,其人则羶种也,其心则禽心也,其俗则毳俗也……彼起于游牧部落,直以中国为其牧场耳,苟见水草肥美,将尽驱其禽兽,横来吞噬”。因此,“吾愿华人,勿复梦梦谬引以为同类也。”^③而唐才常则在1900年夏所写的《正气会序》中宣称:“诂以诸夏之大,人民之众,神明之胄,礼乐之邦,文酣武嬉,蚩蚩无睹,方领矩步,奄奄欲绝,低首腥羶,自甘奴隶,至于此极!……国于天地,必有与立,非我种类,其心必异。”^④谭、唐的这种民族主义思想,显然是从王船山那里直接引申出来的。

船山民族主义思想在辛亥革命以前影响尤为深远。章士钊说:“辛亥革命以前,船山之说大张,不数年而清室以亡。”^⑤著名的民主革命家章太炎在1906年的一次演讲时说:“兄弟少小的时候,因读蒋氏(良骥)《东华录》,其中有戴名世、曾静、查嗣庭诸人的案件,便就胸中发奋,觉得异种乱华是我们心里第一恨事。后来读郑所南(思肖)、王船山两先生的书,全是那些保卫汉种的话,民族思想渐渐发达。”^⑥章氏不仅自己承认其民族主义思想源于读船山著作,而且认为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刊刻《船山遗书》也暗含着民族主义思想。他在《书曾刻船山遗

① 梁启超著,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23页。

② 《谭嗣同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7—338页。

③ 同上书,第341—342页。

④ 《唐才常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97—198页。

⑤ 章士钊:《疏黄帝魂》,载《章士钊全集》第8卷,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第199页。

⑥ 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446—447页。

书后》一文中说：“王而农著书，一意以攘胡为本。曾国藩为清爪牙，踣洪氏以致中兴，遽刻其遗书，何也？衡湘间士大夫以为国藩悔过之举，余终不敢信。最后有为国藩解者曰：‘夫国藩与秀全其志一而已矣。秀全急于攘满洲者，国藩缓于攘满洲者。自湘淮军兴，而驻防之威堕，满洲人亦不获执兵柄，虽有塔齐布、多隆阿辈伏匿其间，则固已为汉帅役属矣。自尔五十年，虏权日衰。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之伦，时抗大命，乔然以桓文自居。巡防军衰，而后陆军继之，其卒徒皆汉种也。于是武昌倡义，尽四月而清命斩，夫其端实自国藩始。刻王氏遗书者，固以自道其志，非所谓悔过者也。’余谓国藩初起抗洪氏时，独以拒袄教、保桑梓为言。或云檄文宣称大举义旗以申天讨者，国藩不肯用。然则种族之辨，夫固心知之矣。……观其刻王氏书，无所剗削。独于胡虏丑名，为方空以避之。其不欲厚诬昔贤，亦彰彰矣。”^① 为国藩辩解者是以曾氏在镇压了太平军之后，汉族官员在清廷的地位不断提高，并且最终导致清朝的覆亡的后果，来逆推曾氏刊刻《船山遗书》的动机。这带有很大的主观猜测的成分。章太炎开始时也是认为曾氏刊刻《船山遗书》是悔过之举，后来之所以改变自己的观点而赞成“为国藩解者”的说法，无非是为了说明船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强大影响力。

除了章太炎以外，还有许多辛亥革命志士都十分推崇船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孙中山在1911年12月发表的《中国同盟会本部宣言》称赞王船山等人“严《春秋》夷夏之防，抱冠带沉沦之隐，孤军一旅，修戈矛于同仇，下笔千言，传楮墨于来世”^②。柳亚子在1906年写的《湘狱》一文中说：“抑湖南者，民族主义之出产地也。明室之季，何腾蛟、堵胤锡矢志抗满，百死而靡所惧。明既亡矣，王船山著书立说，乃力陈夷夏之防，为世昭鉴。曾静、周华，汲其余波，犹足使伪酋惶臧，渊源信有自哉！梟獍之生，厥有曾、左，倒戈天国，献媚虏廷，为湘人之大辱。然曾氏甫陷金陵，即刊船山全集，风示宇内，殆天夺其魄也。自是而后，谭、唐之徒，苦心反正，卒孕戊戌、庚子两役，手段虽异，宗主则同。”^③ 将湖南说成是民族主义的出产地，这是对近代湖南民族主义思想影响的最好注释。柳氏对曾国藩刊刻《船山遗书》的评价，与前述章太炎的看法有相通之处。胡汉民在自传中称：“十五六岁从旧籍中见顾亭林、王船山诸人著述，深感满洲政府以异族宰制诸夏之无理。”^④ 陶成章在《积莪营群书报社序》中说：“昔王船山先生有言曰：‘仁以自爱其类，义以自育其群，若族类之不能自固，而何仁义之足云。’由是观之，舍合群主义外，固别无人道主义；舍民族主义外，亦别无合群主义。”^⑤ 这样，陶氏便将近代西方的人道主义与船山所倡导的民族主义沟通起来。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辛亥革命之前，革命志士们十分推崇王船山的《黄书》。《黄书》之名的由来，既包含有称颂汉民族的始祖黄帝轩辕氏事功的意思，又包括称颂其具有“黄中”美德的意思。船山在该书“古仪”中说：“自昔炎裔德衰，轩辕肇纪，闵阍危，铸五兵，诛铜额，涤飞沙，弭刃于涿鹿之野，垂文鼓弦，巡瑞定鼎，来鸚梦弼，建屏万邦，而神明之胄骈武以登

① 《船山全书》第16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795—796页。

② 同上书，第858页。

③ 同上书，第857页。

④ 同上书，第858页。

⑤ 同上书，第859页。

天位者，迄于刘汉，五姓百十有七后，岂不伟欤！”^①就是说，黄帝用武功战胜了对手，又用文治巩固了汉民族的江山，其功业是十分伟大的。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所以他在此书“后序”中说：“述古继天而王者，本轩辕之治，建黄中，拒间气殊类之灾，扶长中夏以尽其材，治道该矣。”这里的“黄中”一词，出自《周易·坤》：“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朱熹注：“黄中，言中德在内。”可见，“黄中”讲的是一种内在美德，有了它，就可以“拒间气殊类之灾，扶长中夏以尽其材”，从而使治道毕备。这种“黄中”美德也就是汉民族的民族正气。王船山接着说：“故仁以自爱其类，义以自制其伦，强干自辅，所以凝黄中之纲维也。今族类之不能自固，而何他仁义之云云也哉！”^②这就是说，要使汉民族的族类能够稳固地团结起来，就必须继承黄帝的事业，将汉民族的美德（黄中）凝聚起来并且充分地发挥出来。

正是由于船山对黄帝的这种推崇，辛亥志士便将《黄书》视为民族民主革命的旗帜，在清代末年掀起了一股尊黄的高潮。最早重视《黄书》所宣传的民族主义思想者是章太炎，他在自订年谱的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30岁条中说：“康氏（有为）之门，又多持《明夷待访录》，余常持船山《黄书》相角，以为不去满洲，则改政变法为虚语，宗旨渐分。”^③在这里，章氏将是否推崇《黄书》作为改良派与革命派的分水岭。但宋恕则没有这么极端，他在1897年7月的一封信中说：“明季遗老之书，尚有王船山先生之《黄书》一种可与《待访录》同印行世，惜敝篋中无之。诸公可于王船山遗书中检出，与此录同印，实为莫大功德。船山之识稍逊梨洲，就此书论，其文章雅炼则胜梨洲。要之，均非陋儒所能窥其底蕴，吾辈固不可不力任表章之责。”^④1901年，章太炎又在《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叙》一文中指出：“自永历建元，穷于辛丑，明祚既移，而炎黄姬汉之邦族，亦因以渐灭。……讨漠定命，国有与立，抑其秩序无乃凌猎。衡阳王而农有言：‘民之初生，统建维君，故仁以自爱其类，义以自制其伦，强干自辅，所以凝黄中之纲维也。今族类之不能自固，而何仁义之云云。’悲乎！言固可以若是。”^⑤这里，章氏就直接引用了《黄书》中重要言论，以宣传其民族主义思想。1902年，章氏又在《馘书·原人篇》中说：“观于《黄书》，知吾民之皆出于轩辕。”^⑥后来，章太炎《得友人赠船山遗书二通》的诗中说：“一卷《黄书》如禹鼎，论功真过霍嫫姚。”^⑦禹鼎相传为陕西省岐山县出土文物，鼎腹内壁有207字铭文，记录了周王朝与南淮夷、东夷之间的关系以及西周军制等重要资料。霍嫫姚即霍去病，是汉武帝时的一位大将军，因战功封为大司马骠骑将军。他多次率军与匈奴交战，将匈奴杀得节节败退。章氏将《黄书》比禹鼎，是肯定其记载了黄帝的功绩；将船山比作霍去病，是肯定其宣扬夷夏之辨的功绩。上述情况表明，在清末对《黄书》的推崇中，章太炎是起了领导潮流作用的。

① 《船山全书》第12册，长沙：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504页。

② 同上书，第538页。

③ 《船山全书》第16册，第803—804页。

④ 同上书，第804页。

⑤ 《黄帝魂》，1903年“黄帝子孙之多数人”印刷者版，第5页。

⑥ 《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4页。

⑦ 《船山全书》第16册，第800页。

近代尊黄思潮的兴起,其最鲜明的标志是1903年《黄帝魂》一书的出版。此书的编辑是黄藻,字菊人,湖南善化(今长沙)人。他曾参与自立军起义,失败后遁居上海。“喜谈革命,谈不能自休,时而骂人,时而流涕;无可与谈,辄寂寞自写论文,或抉择同时辈流之论文,以湘音讽之。”^①《黄帝魂》就是他“收摄近十年来新闻杂志及各种新撰述之精魂”^②。所以此书的版权页上标注撰述者为“黄帝子孙之多数人”,编辑者则为“黄帝子孙之一个人”。此书出版于1903年12月6日,初版时收文29篇,1911年再版时增至45篇^③。此书采用黄帝纪年,扉页刊印黄帝像,在像的上方标有“世界第一之民族主义大伟人黄帝”,下方标有“中国民族开国之始祖”,并配有对黄帝的“赞”。在收入此书的45篇论文中,据章士钊在《疏黄帝魂》中的分析,有章太炎的论文7篇,有黄藻的论文7篇(不含其《黄帝魂例言》),有章士钊的论文6篇(不含其《黄帝魂序》),有秦力山的论文5篇;此外,邹容2篇,张继2篇,谭嗣同1篇,杨毓麟1篇。其他均为当时报刊论文,姓名不详。

此书篇首,有章士钊以“黄中黄”的笔名所写的《黄帝魂序》。序称:“乃者,胡氛弥漫,中原陆沉,卖身鬻祖,相处百年。鞭策之毒,屠剑之惨,盗入主室,横施无忌。呜呼!复仇之训,剿夷之祖,亦既照人耳目。吾虽不欲祝吾黄帝,诵吾黄帝功德,以纾其痛苦,又乌可得?今《黄帝魂》一书之所以集,正穷迫无聊,欲吾兄弟共诵功德,以纾其痛苦者也。然而谋痛苦之所以纾,而不谋痛苦之所以去,非计也。书中宏议具在,方法井然,举而行之,惟吾同胞。”^④这就清楚地说明,此书出版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共诵黄帝的功德,既纾民族之痛,又谋解痛之方。

纵观此书的内容,实际上已经揭橥了往后兴起的尊黄思潮的基本内涵。其一,是尊黄帝为始祖。此书在黄帝像之下就明确地标明“中华民族开国之始祖”。其二,以黄帝为国魂。黄藻在《黄帝魂例言》中说:“是编所取,皆吾黄帝子孙痛极思呻之言,哀弦激楚,绝无忌避,而又言之井然,读之可泣可歌,可兴可发。意者黄帝在天之灵,实式凭之,故以黄帝魂名篇,亦日本人所谓大和魂之义也。”其三,使用黄帝纪年。此书开篇即为刘师培的《黄帝纪年说》。文中明确指出,采用黄帝纪年是为了对抗改良派以孔子纪年,“黄帝者,乃制造文明之第一人,而开四千年之化者也。故欲继黄帝之业,当自用黄帝降生为纪年始”。其四,鲜明的汉民族主义和排满的倾向。如刘师培说:“当汉敌不绝如线之秋,欲保汉族之生存,必以尊黄帝为急。黄帝者,汉族之黄帝也。”^⑤章太炎则在《驳康有为书》中说:“今日固为民族主义之时代,而可溷殽满汉同薰莸于一器哉?”又说:“今以满洲五百万人临制汉族四万万人而有余者,独以腐败之成法愚弄之、锢塞之耳,使汉人一日开通,则满人固不能宴处于域内。”^⑥

正是由于《黄帝魂》的深刻影响,所以在1904年至1905年之间,尊黄思潮十分高涨。当

① 章士钊:《疏黄帝魂》,载《章士钊全集》第8卷,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第183页。

② 《黄帝魂》卷首,第1页。

③ 《黄帝魂》的目录只有44篇,所以一般介绍此书的资料均说是44篇,其实还有一篇名《祝北京大学堂学生》未上目录,此文在《满学生与汉学生》之后,作者为张继,所以实际收文应为45篇。

④ 《黄帝魂》卷首,第1页。

⑤ 《黄帝魂》,第1—2页。

⑥ 《黄帝魂》,第211—215页。